

怎样办校报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校报研究組

高等教育出版社

怎 样 办 校 报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校报研究組

大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本書由十三篇文章組成。內容包括办校报的几个基本原則問題，有党对校报的领导、校报的群众工作、宣傳工作，以及編輯业务問題。这些問題都是由各自独立的專題文章編述，因此，还比較全面、清楚、深刻。

《党的领导是校报的生命》一文，記述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对校报的领导經驗，其中有右派分子和党争夺校报领导权的激烈斗争，有党委加强对校报领导的具体措施。《新清华的群众工作》一文，介紹了清华大学校报如何依靠群众，开门办报。属于專題介紹的，还有：《北京大学校报怎样报道科学大跃进运动》，《北京师范大学校报关于资产阶级心理学批判的报道》等。

本書的另一部分，是針對新形势下校报工作提出的新問題，探求解决的道路或报道的方向。例如：《怎样报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針的貫徹》一文，提出了“报道中如何反映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等”四个問題，和大家討論。此外，还有論述校报的評論、副刊、标题、文風等文章。这本书为校报工作者提供了急需要的工作、學習参考材料。

怎 样 办 校 报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校报研究組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宣武門內承恩寺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054号)

京华印書局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統一書號 3010·2 開本850×1168 1/16 印張 3 6/16

字數 74,000 印數 0001—3,000 定價(7) ￥0.38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前　　言

“怎样办校报”一書和大家見面了。这是我系編輯的办报經驗研究从書中的一种，很不成熟。

校报是高等学校党委的机关报。自从反右派斗争以来，特别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校报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突出表現在党的领导加强了，政治思想性提高了；在各种斗争和学校的各项工作中，校报成为宣传和貫彻党的路綫、方針和政策，指导实际工作，联系和教育全体师生員工的有力武器。与此同时，各学校在办校报过程中已积累了些經驗，也碰到了些疑难問題，目前及时地把这些經驗加以总结，将一些問題提出来，对进一步办好校报有很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大跃进的形势下，許多原来沒有校报的高等学校，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也陆续創办了校报。他們更是急需要这一类的学习材料，作为进行工作的参考，因此，总结办校报已有的經驗，编写成一本小册子就很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十七位同学深入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近十个高等院校，具体了解各校报的情况，經過二十天的苦战，编写出这本小册子。希望它对办好校报能有帮助。

本書內容基本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某一校报某項工作做得較好的經驗的介紹。例如党的领导、群众工作等項。另一部分是針對当前校报工作的問題，提出我們的初步意見。例如“怎样报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針”、“校报新聞报道中的几个問題”。这里有的是新問題，經驗还未成熟；有的是老問題，至今沒有完全解决。这些問題提出来，只能作为研究参考材料，不能作为定論。由于我們政治水平低，掌握的材料不多，所以有些問題虽然提出了意見，但也沒有能够說清楚，說准确。希望大家批評、指正。另外

有一部分办校报的问题根本没有包括进去。在目前飞跃发展的形势下，给校报提出许多新问题，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研究，这是需要在今后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的。

这本书在编写中间，北京高等学校党委给予了具体的指示和帮助，召开了几次座谈会，集思广益，进行修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钢铁学院等高等院校党委和校报编辑部给予了大力协作。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校报研究组

1958年9月

目 录

前言	v
1 党的领导是校报的生命	1
2 《新清华》的群众工作	7
3 怎样报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贯彻	13
4 北京大学校报怎样报道科学大跃进运动	23
5 北京师范大学校报关于资产阶级心理学批判的报道	31
6 抓先进、抓典型的方法在校报中的运用	38
7 《共青团》专刊如何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45
8 言论—校报工作的旗帜	51
9 新闻报道中的几个问题	57
10 关于校报的副刊	69
11 谈谈校报上的标题	78
12 改进校报的文风	86
13 介绍一篇好通讯	96

党的领导是校报的生命

——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对校报的领导

馬如龙、范靖国、张文濤

北京师范大学校报《师大教学》，几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全校师生的支持下，由不定期改为周刊、五日刊、三日刊，内容逐渐充实，战斗性思想性日益加强。现在它已成为指导工作、向全体师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

校党委重视对校报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办好校报的关键。师大党委非常重视对该校校报的领导，坚决贯彻党的政治路线。高等院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虽然经过党的教育和历次斗争的改造、考验，但并没有完全巩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特别是些老教授、老专家，由于受资产阶级影响深，一些人的立场还很不坚定，对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仍抱着观望、怀疑的态度，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唯心主义哲学还恋恋不舍。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数目很少，在学校范围内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资产阶级时刻都与党争夺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要办好校报，使它成为政治思想斗争的工具，党的领导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这个原因，在整风运动之前，该校党委就重视校报的工作，给予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使它能为无产阶级教育服务。校党委为了办好校报，抽调了思想水平较高的党员干部担任校报的编辑工作。党委会经常关心校报工作，并给以及时的指示。

这样，該校校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發揮了应有的作用。1954年，校报通过音乐系一学生神經失常事件，批判了資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教学观点，向反动的教学思想进行了斗争。后来，校报在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从各方面揭露了他們的罪恶活动，批判了他們的反动观点，对提高师生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右派与党爭夺校报的领导权

北京师大校报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宣传教育的有力武器，資产阶级反动派为了夺取党在学校的领导权，就把爭夺校报的领导权作为进攻的目标之一，打算使校报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在大鳴大放时期，該校右派分子力爭校报脱离党的领导，使它为資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传播他們的資产阶级反动观点。为了和党爭夺校报的领导权，师大右派分子曾費过九牛二虎之力，用过千方百計，斗争得非常激烈。右派曾公开要求給版面，参加編委会。右派分子周之良（前校团委副書記兼宣传部长）就是和党爭夺校报领导权的急先锋。他先后五次写信給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胡駁贊同志，无理地要求改組校报編輯部，要求参加领导工作。为此，他不惜用一切手段，发动反动社团組織，企图强迫校报改組，他改組校报的唯一目的是取消党对校报的领导权。他在党委宣传部會議上和編輯室會議上誣蔑党說：“党委对校报干涉太多了，管得太严了，是應該編輯决定大权还是校党委决定大权？”“党委既不了解校报特点，又不了解‘群众’爱好，却决定稿件取舍。”“党委不懂宣传业务，党委应自觉地把校报讓給懂得业务的人来领导。”“团委会支持改組《师大教学》，整风后校报应改为‘群众’性報紙，而不是党委机关报，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工作，权力最大的是編委会，从現在起就取消党委审稿制度，改組《师大教学》。”

該校党委識破了这些阴谋詭計，加倍重視了对校报的领导，揭露了右派分子对党的领导的誣蔑，批判了“党不懂宣传业务”“不会

領導報刊”的謬論，使右派分子改組校報的惡毒計劃未能得逞，在校報上暴露了右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并及時地在校報上向敵人進行了猛烈的反擊。黨委曾連續召開大會，對這些反黨言行進行了徹底的揭露、批判與說理鬥爭，使右派分子的丑態畢露，無法抵賴，而低頭認罪。他交代時說：“總之，改組校報的實質，就是要改變校報的社會主義方向，從組織上、思想上成為資產階級的報紙，開辟資產階級思想市場。”經過右派分子企圖奪取校報領導權的事實教育，使他們深刻地認識到掌握宣傳工具的重要性，從而更加堅定地保卫黨的思想工作的陣地了。正象具體負責校報領導工作的該校黨委會宣傳部副部長胡點贊同志所說：“這次反右派鬥爭是一場思想戰線上你死我活的鬥爭，沒有黨的領導，校報是不會象今天這樣的。”

反右派鬥爭後黨的領導更加加強

反右派鬥爭以前，校黨委對校報的領導雖然也重視，但具體抓得不緊，因而校報執行、貫徹黨的方針、任務還不够，沒有充分發揮它應有的作用。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校報，雖然過去也登了些政治思想鬥爭的文章，但檢查起來是很不夠的。反右派鬥爭中，由於黨委注意運用校報這一有力工具對敵鬥爭，它的面貌便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反右派期間，《師大教學》為了適應客觀形勢要求，改為日刊。首先在校報上有意識地有準備地公布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使群眾認清是非，然後轉入反擊，号召和右派划清界線，批駁反動言論，揭露罪惡行為。該報先後對右派分子陶大鑑、朱啟賢、胡明、黃藥眠、傅種孙、彭慧、鍾敬文、董渭川、穆木天、周之良、武兆發等，一一徹底進行批判，把所謂“教授治校”“民主辦校”，“肅反擴大”“中共失策”等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駁得體無完膚，對各種陰謀活動都進行了揭發，使得右派分子的惡毒計劃和陰險活動大白於群眾眼下。這樣一來，激起了群眾的憤恨，師生向右派

分子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严肃的說理斗争。在铁的事实面前和群众的声討下，右派分子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認罪。例如对右派分子傅种孙（前副校长）的斗争，开始时，有些学生曾被他平时玩弄的两面手法所迷惑，認不清他的真象，后来校报就配合整个斗争，連續揭发了他的罪恶活动，群众就立即認清他的右派面目。例如在报道教授座谈会的消息时，在标题上指出：“大家認為傅副校长是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要求彻底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該校报在反击右派中，每天都有計劃地和党委的工作部署密切結合，重点地、集中地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因此，那时的報紙作用很大，鼓舞着群众的斗争情緒，指导着运动的发展，深受师生欢迎。师生每天等着校报，一时看不到就到处寻找。由于党委加强了对校报的领导，注意运用校报指导和推动工作，使校报能够及时了解党的方針、政策和党委意图，就使它能够根据当前中心工作，大力組織报道，发挥了它应有的宣传、教育和指导作用。在“双反”运动中，教学改革运动中，《师大教学》也都密切地配合了党委的中心工作，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解决了学生中的許多思想問題。如首先报导了化学系白手起家办工厂的消息后，有人怀疑：理科可以办，文科能否办？后来校报就連續报导了中文系、俄文系办工厂的情形，解除了这些怀疑思想。由于該校大办工厂，有十五个兄弟学校来师大參觀学习，这样就更推动了大办工厂。再如在教学改革运动中，对修改教学計劃和教学大綱，有两种道路和两种方法，一种是修修补补，沒有打破旧框子，改革不大；一种是以革命的精神，作根本的改革。对待改革也有两种教学方針，一种是总支挂帅，走群众路綫；一种是走专家路綫。針對这一情况，校报根据党委指示的精神，发表了社論，并大量报导了在党领导下，青年学生破除迷信發揮集体智慧，敢想敢干，編写出教学大綱的事实。这就为群众指明了努力方向，有力地推動和指导了教学改革运动。

从以上事实看，校报要办得好必須党加强领导。任何脱离党

的領導的傾向都是非常危險的。

黨委怎樣領導校報？

中共北京師範大學委員會經過同右派在校報領導權上的激烈鬥爭，更深刻地認識到加強對校報的領導的重要意義，從而採取了許多措施，來加強領導。

首先是加強政治思想領導。為了加強政治思想領導，校黨委早在1956年反右派鬥爭以前就討論了校報工作，明確指出校報是黨委的機關報，並確定了校報的任務是：“在學校範圍內及時地、正確地宣傳黨和國家有關的方針、政策，推動和改進教學工作，對群眾進行思想教育。”並且強調指出：“校報的宣傳應該加強思想性與戰鬥性。”這樣，就使《師大教學》更加明確了方向。黨委經常在重大的方針、政策問題上給編輯部人員以指示，並且讓有關編輯參加黨的一些重要會議（有時還參加常委會）。編輯未能參加的會議，黨委負責同志立即在會後傳達。黨委負責同志在黨委會上和總支書記聯席會上，屢次強調說明校報在政治思想上的指導作用，要求黨組織的每個成員都重視校報。師大黨委負責同志親自為校報寫稿，並組織稿件，對一些重大事件和問題，還在黨的會議上研究如何報道。在平時，黨委則加強對校報的監督和檢查。如歷史系學生到門頭溝參加勞動的收穫一稿，對同學勞動鍛煉有極大影響，編輯人員沒有重視，安排在版面的不顯著地位，後經黨委指出，才放在顯要地位。為了對校報在政治上負責，由黨委會一位書記負責審大稿。黨委委員都關心校報，審查報導有關自己領導下的工作的稿件。現在，《師大教學》每期的報道中心和計劃，都緊密結合着全校中心工作，貫徹了黨委的意圖。

其次是加強組織領導。在反右派以後，黨委給校報編輯部調來一個黨員同志，並清除了曾和黨鬧對立、奪取校報領導權的分子。列寧、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在組織問題上，重要的問題乃是挑

选人員和检查执行。在报刊內工作的，應該是那些在政治上清醒的、有文化的并且受过考驗的人們。他們應該善于为報紙写东西，并且有組織家的才能。师大党委确定一位党委副書記和一位宣传部长，負責校报的經常領導工作。为从組織上加强党对校报的领导，师大党委会曾經作出这样的决定：“……党委必須加强对校刊工作的领导，定期討論校刊的工作，并且党委宣传部負責对校刊經常工作的领导，团委会、工会、学生会及各系党、团支部和基层支部等都必須給校刊以积极的支持，負責督促和检查各有关方面对校刊的通訊报导工作，提供校刊报道所需要的情况和問題，各单位的負責干部有責任給校刊写有关問題的社論，全校师生員工都要关心和支持校刊。”从这个決議中可以看出，党委为了办好校报，发动各种組織重視和参加校报工作，党的各級組織也都非常重視校报，积极为校报組稿。各总支为了办好校报，在政治上为校报負責，都主动审查稿件，并且指定优秀的黨員当校报的通訊員、記者。化学系为了加强通訊工作，曾挑选了优秀的黨員担任通訊員，使全系通訊工作有了起色。

另外是：党委亲自动手，具体指导，及时督促。

师大校报上的有些报道和社論是校党委会宣传部、党委委員写的。除此以外，他們在每个中心运动来临时，都具体指导校报的报道工作，常常把自己发现的新事物、典型人物和好經驗，告訴校报或組織报道。这样就提高了校报的报道質量。例如在貫彻教学与劳动相結合的方針中，同學們在门头沟、百花山劳动，党委亲自指出这一劳动的意义，要校报立即采訪和报道，来鼓舞全校同学的劳动热情。为了培养又紅又专的大学生，树立先进旗帜，在党委指导下把《王孝元是又紅又专的旗帜》一篇文章放在显著的地位。另外党委委員还經常向編輯部推荐一些新鮮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事例，列入編輯部的报道計劃。《师大教学》就是这样在党的坚强领导和經常关怀下成长壮大起来的。

《新清华》的群众工作

朱中良、董鳴

逐渐明确了群众办报的方针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也是我们办报的根本路线。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这是办好无产阶级报刊的两个关键。校报是学校党委的机关报，不能例外，要办好校报，也必须紧密依靠学校党委和全体教职工及学生，也就是说要“全党办报，全校办报”。

《新清华》是清华大学党委的机关报。整风运动以来，明确了群众办报的方针，并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群众办报的重要意义，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群众办报的组织系统。

整风运动以前，《新清华》也建立了通讯组织；全校有一百多个通讯员，教师、职工、学生，甚至校友中，都有通讯小组，但作用不大。编辑室人员认为，经常参加党委及团委的常委会，掌握了全校的基本动态，也就差不多了。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着较严重的“关门办报”的偏向，报纸上来自群众生活中的东西不多，版面不生动活泼，像个“业务报”。编辑室经常联系的是几个教师通讯员和学生中的少数通讯员，职工及校友中的通讯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联系。能起作用、经常参加工作的，不过为数有限的几个人。

整风期间，群众曾尖锐地批评了校报编委会联系群众不够，工作不深入与关门办报的偏向。编辑同志就仔细地研究了群众的意见，检查了自己的工作作风，并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开始认识到过去的确存在着脱离群众、关门办报的毛病。

对学生中的思想情况，团委会比校报编委会了解得更清楚；团委会还单独有一个宣传组，有很大一批人马。因此，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有必要更多地依靠团委会。于是，校报编委会决定和团委会协作，编辑室人员紧紧地和团委会宣传部取得联系，成立学生编辑组，团委会也派一个宣传部副部长任组长，参加校报关于学生方面的制订计划、审稿等具体工作。这时，校报的力量加强了，但发动广大的群众还很不够。

经过红专大辩论，全校掀起了勤工俭学、科学的研究的高潮，奇迹不断产生，反映共产主义风格的新新人事每时每刻地都在涌现。这又向《新清华》编委会提出了新的问题：编委会虽已与团委会取得联系，但团委会的人力毕竟有限，在这种情形下，如何才能把新形势下出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新新人事，及时、广泛而又生动地反映出来呢？在攀登科学顶峰的活动中，常常是教师与学生联合作战。如何才能把教师的活动也及时地报道出来，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呢？今年七月经过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各系党总支成立宣传组，统一对外发稿，这样就出现三套宣传系统：校报编辑人员，学生宣传组和党总支宣传组，于是试行三结合的办法：《新清华》的一套人马、团委会的一套人马，还加上各个系的宣传组共同报道一些中心事件。经常性的报道由总支抓。在总支宣传组下，教师中的每个教研组、职工中的每个科室、学生中的每个班以及勤工俭学工厂中的每个车间，各设立一个通讯员。由于编委会加强了对各系记者站的联系和对通讯员的培养，因而大大地发挥了记者站和通讯员的作用；同时，从编委会到各个最基层单位，都一气相通，全校每个角落发生的大小事情，都能很快地反映上来。《新清华》对于中心工作的宣传，不仅没有削弱，而且由于全党、全校师生员工一起来办报，使中心工作的宣传更加有力，报纸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大大提高。

依靠党，发动群众，开门办报

《新清华》编委会的组织成员很广泛，除了编辑室负责人以外，还有党委会、团委会、教务处、科学研究所、生产办公室及工会、学生会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由党委会一位副书记直接领导。编委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党委将党的方针、政策及宣传中心告诉大家，各单位再提出自己的宣传要求，然后确定当前宣传工作的中心，制订宣传报道计划。这样，校报在每个时期都有明确的方向，清楚地掌握住全校的动态，宣传也就有的放矢了。

各单位负责同志工作虽然都很忙，但他们没有把参加校报工作看作是额外负担，而是把它当做推动工作的有力工具。因而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校报在一段时期内，对某一单位的报道较少，而对其他单位的报道较多，这一单位的负责同志马上就会想：“为什么对我们的报道少啦，”就马上积极组稿、写稿，要求校报给他们一定的版面，反映他们的情况。

报纸每一期出版前，都要打八九份大样，送交六个党委书记、一个团委书记和一个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审查。这些同志认真阅读每一篇重要稿件，涉及到自己工作范围内的事情，他们更是仔细推敲，逐句修改。这样做，对提高校报的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校党委不仅加强对校报的领导，而且不断教育全体师生关心校报，动员大家为校报写稿，这就更加鼓舞了编辑人员发动群众办报的积极性。党委负责同志还常常亲自为校报写评论及其他重要稿件。

校报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呢？《新清华》有六个专职编辑，他们每人都下到一个或几个系的宣传组去。编辑室把权力下放，记者站可以根据编委会的计划，制订自己的报道计划，布置系里各基层单位的通讯员，组织或编写稿件。总支宣传组也有自己的编辑和记者。稿件组织或编写完了以后，就在记者站讨论、审查、修

改，不行的退回去重写。当总支宣传组的稿件送到编辑室的时候，差不多都已经是成品了，有的连标题都标得很好，编辑室稍经加工就可采用。各个系的记者站实际上起了编辑分室的作用。例如水利系记者站，有十几个编辑和记者，党团总支和记者站负责人组成一个核心小组，形成坚强的领导。他们除了做上面所说的记者站的一般工作外，还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稿件评比制度、工作检查制度，并经常收集资料。稿件评比是利用定期召开的评比会来进行的，会上大家把近一个阶段较好的新闻、通讯或标题，拿出来评比，研究好在什么地方，最后把选出的优秀稿件公诸于众。记者站每天还记工作日记，检查当天的工作情况。

对于有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更充分反映《新清华》编辑室如何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我们曾了解了他们对于土电厂的报道过程。这个土电厂是贯彻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而建立的一座燃料综合利用的工厂，周总理视察清华大学的时候，对它很感兴趣，特地参观了这个工厂，并向厂里的同志“订货”，把它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要求他们提前并大规模地投入生产。这件事大大鼓舞了建设工厂的教员和学生，他们决定在国庆以前开始发电，其他综合利用的产品也正式进行生产。随着这一决定而来的是人力、材料等各方面的困难，这就需要动员全校的人力、物力来支援它。校报决定用一版半的篇幅来报道土电厂。但怎么报道，组织哪些稿件，编辑室都没有底。编辑室派了一个人去跟土电厂的宣传小组取得联系，他和宣传组的几个学生在一起，拟定了报道提纲，商量好了组织哪些稿件。然后，从了解线索、采访、写、修改、定标题，直到版面设计，全部过程都由这几个学生来负责，编辑室人员只不过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学生们组织来的稿件中，有新闻报道、通讯特写、小言论、诗歌、图画、照片等，真是丰富多彩。设计版面的时候，有的人主张版头搞一个工厂图做衬景，有的人主张用一个通栏大标语来统括全版，有的人主张标题这么摆，有的人主张文章

那样排。經過研究，結果把七八种方案归纳成一个方案，集中了大家的智慧，設計出大家滿意的版面。編輯室沒有花太大的力量，就拿回去一份成型的报道土电厂的版面設計。

群众办报的优越性

貫彻了群众路綫，实行了“全党办报、全校办报”的方針以后，从《新清华》的版面上看，无论是否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很大的起色，《新清华》在全校教职工及学生中的威信，也立即提高了，大家对它发生了兴趣，不仅願意看，而且也願意为它写稿。

群众办报的优越性，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校报的质量提高，思想性和战斗性加强。校报紧紧依靠党委会，党委会也派专人领导校报，党的方針、政策及指示，都能迅速地貫彻到校报編委会中去，編輯室及时地向各系記者站传达，各系的群众編輯和記者便能很快地将本单位貫彻执行党的方針政策的情况反映到校报上来。校报編輯深入群众，下到各系，能及时发现群众中出現的新事物和新問題。如全校紅专大辯論結束，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校刊及时登載了政治立場坚定、品学兼优的学生的事迹，插起了红旗，全校学生立即找到了学习的榜样，甚至有的清华职工也反映說：“我一遇到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想起曲淑鳳（工农子弟、优秀学生）来。”

第二，群众积极性發揮起来，大家都来关心校报，热心为校报写稿，稿件源源不断，解决了稿源不足的問題。由于編委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也逐渐把校报当作是自己的報紙。現在全校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馬上就有人来向編輯室“通风报信”，通訊員甚至直接就把稿子写好，交到系記者站。有时事情将要发生但还没有发生，如某一单位将开一个重要會議，或某一項科学的研究即将成功，編輯室还不知道呢，電話就打来了，請求派記者去报道，或者是問这篇稿子該怎么写，等事情一发生，稿子馬上就